农民工返乡定居意愿及其影响因素分析*[1]

——基于上海、南京、苏州等地农民工的调研数据

孙小龙 王丽明 贾 伟

【摘 要】本文基于2014年对上海、南京、苏州等地的农民工调研数据,采用Logit模型就农民工返乡定居意愿进行实证分析。所得结论:①84%的外出农民工具有返乡定居意愿,老一代农民工返乡定居意愿稍高于新一代。②务工地是否有住房、家庭人均收入、对农业政策了解程度、回乡便利性等对农民工返乡定居意愿的影响为负,年龄和工作经历等对农民工返乡定居意愿的影响为正,但对老一代农民工和新一代农民工返乡定居意愿的影响存在差异。③大城市不是农民工的未来定居地,不少农民工对定居农村还是城市持不确定态度。

【关键词】农民工返乡 定居意愿 Logit模型

【中图分类号】F323.6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3—7470 (2015)—10—0101 (05)

一、问题的提出

农村劳动力由农村向城镇、农业向非农业转移,不仅促进了国民经济增长,而且增加了自身收入。农村劳动力转移人数逐年增加,据统计,过去 10 年,农民工以每年 500 万~700 万人的净增量流动,截至 2014 年,农民工总量已达到 2.74 亿人,其中,外出农民工 1.68 亿人。① 农民工流动处于不确定的状态,同时存在流入和流出。较高收入、较好生活条件、教育以及公共资源优势等吸引农民工不断涌入城市,然而,农民工不得不面临定居城市的现实困境:城市定居还是农村定居。1990 年以后出生的农民工逐渐成为流动的主体,这些农民工与以往的农民工在诸多方面均存在差异,如农业生产经验缺乏、区域流动性强、向往城市生活方式等;本研究主要就农民工返乡定居意愿及其相关影响因素进行分析,比较 1990 年以前(简称“老一代”)和以后出生的(简称“新一代”)农民工在返乡定居意愿上有何差别,为政府制定相关的政策提供建议。

对农民工定居问题的探讨,诸多学者基于调研数据,着重对农民工定居城市意愿进行分析,其研究结论相对一致。[1~3]但就农村而言,农民工定居城市的意愿较高。[4] 相对于不发达地区的城市,农民工定居发达地区城市的意愿下降,农民工定居中小城市的意愿最高。[5] 农民工个体特征和家庭特征对农村劳动力流动的影响较为明显,[6~8] 男性、年轻、受教育水平高、未婚的农民工更愿意在城市工作和生活,一般不会做出回流的决策,家庭人均土地少、家庭经济水平较低的农民工返乡意愿越低。[9] [10] 其他特征主要包括社会保障和农民工来源地的经济发展状况等。[11] 有社会保障的农民工返乡意愿较弱,但参加新型合作医疗和城镇医疗保险的农民工在返乡定居意愿上则存在明显的差别,[12] [13] 参加新型农村合作医疗明显增强了农民工的返乡意愿,参加城镇医疗保险对农民

[1] **作 者:**孙小龙 博士研究生 中国农业大学经济管理学院 北京市 100083

王丽明 博士研究生 中国农业大学经济管理学院 北京市 100083

贾 伟 副研究员 中国农业科学院农业经济与发展研究所 北京市 100081

①数据来源:人民网(http://politics.people.com.cn)。

工的“吸纳效应”却并不显著,城镇医疗保险较高的参保门槛及其“不可携带性”降低了农民工的医疗保障水平,阻碍了农民工的市民化进程;[14] 农民工返乡定居意愿取决于流出地的地区经济发展状况,相对来说,农民工流出地经济发展状况较好的农民工,返乡定居意愿就相对较高;[15] 心理因素也是影响农民工定居城市的主要方面,对农民工流动的态度,相对剥削感与从众心里对新生代农民工市民化意愿存在负向影响。

现有文献对本研究进一步分析农民工返乡定居意愿提供了一定借鉴,但大多研究成果未考虑到农民工的代际差异,新一代和老一代农民工在生活方式、习惯上对农业生产及相关政策的认知程度等均存在差异,笔者基于 2014 年对上海、南京、苏州等地农民工的实地调研数据,利用 Logit 模型就农民工返乡定居意愿进行分析,比较了新一代和老一代农民工返乡定居意愿差异。

二、研究方法与数据来源

1.研究方法

本研究使用的研究方法为 Logit 模型。因变量为二分类变量,即第 i 个样本的因变量发生概率与不发生概率之比,称为事件发生比。将发生比取自然对数值即 $Ln\left(\frac{p}{1-p}\right)$,Logit 模型假定它与自变量之间存在线性关系。一般采用最大似然法估算模型的参数值。将各自变量的参数值 β 进行指数转换之后,得到 Exp（β),表示自变量的单位变化引起的因变量发生比的变化幅度,被称为发生比。X’ 表示由自变量所形成的向量;β 表示各自变量所对应的系数,如式①所示:

$$Ln\left(\frac{p}{1-p}\right)=X'\beta \qquad ①$$

2.变量选取

因变量为农民工返乡定居意愿,自变量为农民工个人特征(性别、年龄、婚姻、受教育水平)、家庭收入状况、村庄交通是否方便、对农业政策了解状况、是否参加技术培训、务工地是否有住房、工作经历是否有帮助(过往工作经历是否对再次寻找工作有帮助)、外出农民工每年回家次数;本研究所提及的返乡定居指的是农民工返回户籍所在地的地市定居,并非具体的户籍所在地。各变量定义及赋值如表 1 所示。

表 1　　变量的统计性描述

变量		变量赋值	平均值	标准差
被解释变量	农民工返乡定居意愿	0＝不愿意返乡定居；1＝愿意返乡定居。	0.84	0.37
解释变量	性别	0＝男性；1＝女性。	0.42	0.49
	年龄	实际年龄（岁）。	27.67	8.16
	婚姻	0＝未婚（含离异）；1＝已婚。	0.53	0.50
	受教育水平	1＝初中及以下；2＝高中（中专、职业教育）；3＝大专；4＝本科；5＝研究生及以上。	1.79	0.66
	家庭人均收入	1＝3000 元以下；2＝3001～5000 元；3＝5001～8000 元；4＝8001～15000 元；5＝15000 元以上。	1.77	0.92
	村庄交通方便程度	1＝很方便；2＝方便；3＝一般；4＝不方便；5＝很不方便。	2.45	0.89
	农业政策了解程度	1＝很不了解；2＝不了解；3＝一般；4＝了解；5＝很了解。	2.62	0.78
	技术培训经历	0＝有；1＝无。	0.51	0.50
	务工地是否有住房	0＝无；1＝有。	0.07	0.26
	工作经历是否有帮助	1＝非常没有帮助；2＝没有帮助；3＝一般；4＝有帮助；5＝很有帮助。	3.77	0.79
	外出务工回家次数	1＝1 次；2＝2 次；3＝3 次；4＝4 次；5＝5 次及以上。	2.29	1.25

数据来源：根据调研数据整理而得。

3.数据来源

本研究数据来源于课题组于2014年11月至12月的实地调研所得,[②2] 主要选择上海市松江区,江苏省苏州市(经济开发区、昆山市),南京市经济技术开发区等地企业12家,调研对象主要为1975年以后出生的农民工。调研采用问卷和座谈相结合的方式,收集问卷393份,其中有效问卷共378份,包含南京(94份)、苏州(171份)、上海(113份),问卷有效率96.18%。

调研数据显示,约有84%的农民工有返乡定居意愿,相对新一代农民工,老一代农民工返乡定居意愿更为强烈,具有返乡定居意愿的老一代和新一代农民工的比重分别为87%和80%。南京农民工的不返乡定居意愿与返乡定居意愿的比重明显小于上海,经济程度越发达地区的农民工返乡定居意愿的可能性越大。农民工收入逐年增加,但与外出务工地住房价格相比,收入水平仍然较低,农民工在务工所在地购买住房或长期租房的可能性不大,因而其返乡定居意愿相对较强。

表 2　　农民工回乡定居意愿的情况

样本调研地	总样本（人）	老一代农民工（N=191）		新一代农民工（N=187）	
		不返乡比（%）	返乡比（%）	不返乡比（%）	返乡比（%）
南京	94	5	10	10	25
苏州	171	6	35	8	42
上海	113	2	42	2	13
总样本	378	13	87	20	80

数据来源：根据调研数据整理。

在378 个调研样本中, 从性别看, 约有41.5%的农民工为女性,男性和女性农民工返乡定居意愿均较为强烈,且两者差异不大。从年龄看,1990年以后出生的农民工约占农民工总量的41.5%,年龄越大,其返乡定居意愿越强烈。从婚姻来看,已婚农民工占调研样本总量的一半以上,已婚和未婚农民工返乡定居意愿的差异不大。从受教育水平来看,57.9%的农民工受教育水平为高中,受教育水平在初中及以下的农民工返乡定居意愿相对较高,受教育水平在高中以上的农民工中返乡定居意愿较低。从家庭人均收入来看,83.6%的农民工家庭人均收入均在5000元以下,家庭收入越高的农民工越不愿意返乡定居。从村庄交通方便程度

[2] ②张崇尚、荣宏伟、李晓攀等参与了此次调研。

看,90.21%的农民工对村庄交通方便程度较为满意,但没有影响到农民工返乡定居意愿。从农业政策了解程度看,10.1%的农民工对农业政策了解,相比其他农民工,了解农业政策的民工返乡定居意愿小。从技术培训经历看,50.8%的农民工曾经接受过技术培训,与没有接受过技术培训的农民工相比,农民工返乡定居的愿意基本无差异。从农民工务工地是否拥有住房看,92.9%的农民工在务工地没有住房,与拥有住房的农民工相比,此类农民工更倾向于返乡定居。从工作经历是否有帮助来看,仅有6.1%的农民工认为工作经历对再次寻找工作没有帮助,这部分农民工返乡定居意愿并不高,认为工作经历对再次寻找工作有帮助的农民工返乡定居意愿的比重为85%。从外出务工每年回家次数看,约有31.2%的农民工每年回家超过2次,回家越频繁的农民工其返乡定居意愿就越弱。

三、实证结果分析与讨论

本研究运用Logit模型进行回归,回归结果整体较好,拟合程度相对较高,基于总体及新一代、老一代农民工返乡定居意愿均通过P值检验,模型结果分析与讨论如下。

1.农民工返乡定居意愿

受教育水平、性别和婚姻等对农民工返乡定居意愿的影响不显著,这与其他学者的研究存在差别,不少学者证实受教育水平、性别以及婚姻对城市定居具有显著的影响,这可能与其选取的调研地点有关系;上海、南京和苏州属于一线城市且房价相对较高,农民工在这样的发达城市定居困难。年龄对农民工返乡定居意愿的影响为正。年龄越大,返乡定居意愿越强烈;随着年龄增长,农民工更加渴望稳定的生活,且由于子女需受教育的需要,农民工更加倾向于返乡定居。

家庭人均收入对农民工返乡定居意愿的影响为负。家庭收入越高,返乡定居意愿相对越弱,在城市定居的可能性越大。家庭收入水平所决定的经济实力在农民工选择是否定居打工城市起着重要作用,城市生活使农民工不得不支付较高的成本,家庭收入水平高的家庭才有能力承担。

农业政策了解程度对农民工返乡定居意愿的影响为负。对农业政策了解越深,其越不愿意返乡定居;最近几年,党中央惠农政策力度较大,农民享受到的惠农政策及金额逐渐增多,增加了农民收入,但并没有提高农民从事农业生产的积极性,农民工外出数量仍然持续增加。相对于外出务工收入而言,来自农业的收入仍然较低。农民工想从农业中获得与外出务工同等的收入,除非承包相应规模土地,然而,在农村并非人人都能承包到土地。因此,农民工对农业政策越了解,返乡定居意愿越弱。

务工地是否有住房对农民工返乡定居意愿的影响为负。农民工在务工所在地有自己的住房,返乡定居意愿弱。调研显示,大多农民工均抱怨“住房条件差且太贵,买不起房,外出务工几年,攒些钱就回老家”。住房贵成为阻碍农民工定居城市的主要原因,对大多数农民工而言,外出务工不是为了在大城市定居,而是为了赚取更高收入,再返乡定居。

工作经历是否有帮助对农民工返乡定居意愿的影响为正。认为工作经验对再次寻找工作有帮助的农民工,越倾向于返乡定居;农民工在城市务工所积累的工作经验,能够帮助他们在家乡所在地找到合适的工作,促使他们返乡定居。

外出务工每年回家次数对农民工返乡定居意愿的影响为负,农民工每年回家次数越多,返乡定居意愿越弱。农民工每年回家次数增多逐渐弱化其对家庭的情感,正如调研中有些农民工反映“每次回家,看到家乡的变化并不大,大多同龄玩伴都外出务工,回家了找不到人玩”,这可能成为农民工返乡定居意愿较弱的主要原因。

表 3　　农民工回乡定居意愿影响因素的模型估计结果

变量	系数	标准误	边际效应
性别	−0.0743	0.3288	−0.0083
年龄	0.0934***	0.0344	0.0104
婚姻	−0.6303	0.3849	−0.0700
受教育水平	−0.3289	0.2431	−0.0365
家庭人均收入	−0.2760*	0.1589	−0.0306
村庄交通方便程度	−0.0360	0.1864	−0.0040
农业政策了解程度	−0.3803**	0.1937	0.0422
技术培训经历	−0.1826	0.3237	−0.0203
务工地是否有住房	−2.2095***	0.5033	−0.2453
工作经历是否有帮助	0.4714**	0.1897	0.0523
外出务工每年回家次数	−0.2491**	0.1179	−0.0277
常数项	1.5358	1.4595	
观测值		378	
Pseudo R^2		0.1716	
LR chi2		57.32	
Prob>chi2		0.0000	

注：*、**、***分别表示在10%、5%和1%的水平上显著。

2. 基于代际视角的新一代和老一代农民工返乡定居意愿比较

性别对老一代农民工返乡定居意愿的影响为负，对新一代农民工返乡定居意愿影响不显著。相比男性，女性老一代农民工更不愿意返乡定居；女性新一代农民工返乡定居意愿与男性差异不大。女性农民工打算在流入地定居意愿更强烈，她们往往希望通过婚姻方式实现自身命运和身份的转变。年龄对老一代农民工返乡定居意愿的影响为正，对新一代农民工返乡定居意愿的影响并不明显。年龄越大，老一代农民工越倾向于返乡定居；新一代农民工比老一代农民工拥有更少的务农经历，容易适应大城市的陌生

生活，并且他们更追求大城市的现代生活，留在大城市生活的欲望强烈。婚姻对新一代农民工返乡定居意愿的影响为负，对老一代农民工返乡定居意愿的影响并不明显。已婚的新一代农民工不愿意返乡定居，他们向往和逐步习惯了大城市的生活方式，且配偶大多在同一城市打工；对老一代农民工而言，婚姻并没有影响到农民工返乡定居意愿，大多已经成家，但子女仍然在家乡。

家庭人均收入对老一代农民工返乡定居意愿为负，对新一代农民工返乡定居意愿并没有产生影响。家庭人均收入越高，老一代农民工返乡定居意愿就越弱，老一代农民工更希望自己以城市定居的方式实现子女享受高质量的城市教育。

变量	新一代农民工			老一代农民工		
	系数	标准误	边际效应	系数	标准误	边际效应
性别	0.4343	0.4476	0.0601	−0.9978*	0.5618	−0.0773
年龄	0.0795	0.1044	0.01100	0.0740*	0.0476	0.0058
婚姻	−0.9327*	0.4986	−0.1291	−0.5120	0.7713	−0.0397
受教育水平	−0.2983	0.3661	−0.0413	−0.4605	0.3709	−0.0356
家庭人均收入	−0.0333	0.2253	−0.0046	−0.5661**	0.2503	−0.0438
村庄交通方便程度	−0.0920	0.2263	−0.0127	0.1122	0.3523	0.0087
农业政策了解程度	−0.3354	0.2533	0.0464	−0.6458*	0.3301	0.0499
技术培训经历	−0.4709	0.4121	−0.0652	0.3118	0.5654	0.0241
务工地是否有住房	−1.8736**	0.8447	−0.2594	−2.3490***	0.7009	−0.1818
工作经历是否有帮助	0.3462	0.2490	0.0479	0.4708	0.3444	−0.0364
外出务工每年回家次数	−0.3042*	0.1574	−0.0421	−0.3043*	0.2031	−0.0235
常数项	1.3725	2.7173		2.1304	2.6179	
观测值		187			191	
Pseudo R2		0.1134			0.2948	
LR chi2		21.09			42.57	
Prob>chi2		0.0325			0.0000	

注：*、**、***分别表示在10%、5%和1%的水平上显著。

农业政策了解程度对老一代农民工返乡定居意愿的影响为负,对新一代农民工返乡定居意愿的影响并不显著。相比较而言,老一代比新一代农民工对农业政策的关注度高得多,对农业政策带来的优惠更为了解;新一代农民工从学校毕业后直接外出务工,对农业生产和政策缺乏认识和关注。

务工地是否有住房对新一代农民工和老一代农民工返乡意愿的影响均为负,不管对于新一代和老一代农民工而言,只要城市拥有住房,其更倾向于在城市定居;两者比较而言,住房对新一代农民工返乡定居意愿高于老一代农民工。

外出务工每年回家次数对新一代和老一代农民工返乡定居意愿的影响均为负,每年回家次数越多,新一代农民工返乡定居意愿弱于老一代农民工。老一代农民工在家乡生活的时间较多,对家乡更加充满感情,且其子女大多在家乡受教育,因而返乡定居意愿高于新一代农民工。

3.对农民工返乡定居意愿的进一步分析

大多数农民工具有返乡定居意愿,但对“您愿意在农村或城市定居”这一问题的选择中,选择居住在城市的仅有20.11%,与农民工返乡定居意愿基本相符,选择不确定的占了57.14%,这也间接说明了这部分农民工并不愿意居住在大城市,但又不能确定将来是在农村还是城市生活,可能中小城市才是未来农民工最佳的定居场所,具体结果见表5。

表5　　农民工返乡定居具体地点

选项	频数	比例（%）
不确定	216	57.14
城市	76	20.11
农村	86	22.75
总体	378	100.00

数据来源：根据调研数据整理。

四、研究结论与政策建议

本研究结论如下:①84%的外出农民工具有返乡定居意愿,相对新一代农民工,老一代农民工返乡定居意愿更为强烈。②务工地是否有住房、家庭人均收入、对农业政策的了解程度、农民工每年回家次数对农民工返乡定居意愿的影响为负,年龄和工作经历等对农民工返乡定居意愿的影响为正,且对新一代和老一代农民工返乡定居意愿的影响具有差异。③尽管农民工返乡定居意愿较为强烈,但仅有少量农民工选择农村作为未来的定居地,大多农民工对返乡定居地是农村还是城市持不确定态度。

根据上述研究结论,笔者提出相应政策启示:①推行廉租房或公租房,解决农民工住房问题。在农民工相对集中的城区区域,建设公租房解决农民工的住房问题。在农民工相对不集中的城市区域,通过长期租赁或购买住房作为公租房房源,用于安排进城农民工的住房问题。同时也可以拿出一部分廉租房来解决进城农民工的住房问题。②推进城镇化建设,发展中小城市。尽管农民工外出务工收入提高,仍难以承受大城市的房价和较高的生活成本,中小城市可能成为农民工返乡定居的主要场所。③引导就业方

向,优化农民工工作生活环境。稳定就业是农民工融入城市的开始,创造平等公开、公平对待的就业环境,引导和支持农民工合理流动。

参考文献:

〔1〕〔14〕夏怡然.农民工定居地选择意愿及其影响因素分析——基于温州的调查[J].中国农村经济,2010,(03).

〔2〕〔9〕戚迪明,张广胜.农民工流动与城市定居意愿分析——基于沈阳市农民工的调查[J].农业技术经济,2012,(04).

〔3〕夏显力,姚植夫,李 瑶,贺 强.新生代农民工定居城市意愿影响因素分析[J].人口学刊,2012,(04).

〔4〕〔10〕费喜敏,王成军.基于推拉理论的农民工定居地选择意愿的实证研究[J].软科学,2014,(03).

〔5〕赵耀辉.中国农村劳动力流动及教育在其中的作用——以四川省为基础的研究[J].经济研究,1997,(02).

〔6〕张 杭,栾敬东,徐志刚,郭秧全,钟甫宁.农村发达地区外来劳动力移民倾向影响因素分析[J].中国人口科学,1999,(05).

〔7〕马九杰,孟凡友.农民工迁移非持久性的影响因素分析——基于深圳市的实证研究[J].改革,2003,(04).

〔8〕李 强,龙文进.农民工留城与返乡意愿的影响因素分析[J].中国农村经济,2009,(02).

〔11〕续田曾.农民工定居性迁移的意愿分析——基于北京地区的实证研究[J].经济科学,2010,(03).

〔12〕秦雪征,周建波,辛 奕,庄 晨.城乡二元医疗保险结构对农民工返乡意愿的影响——以北京市农民工为例[J].中国农村经济,2014,(02).

〔13〕余运江,孙斌栋,孙 旭.社会保障对农民工回流意愿有影响吗?——基于上海调查数据的实证分析[J].人口与经济,2014,(06).

〔15〕张笑秋.新生代农民工市民化意愿心理影响因素的理论框架[J].西北农林科技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5,(03).